

C53  
481.

# 30年

30 NIAN HUIGU  
YU PINGXI

## 回顾与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报告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 编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JINIAN GAIGE KAIFANG 30 ZHOUNIAN  
XUESHU BAOGAOJI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30年 回顾与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报告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30 年回顾与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学术报告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097 - 1012 - 8

I. 3 … II. 中 … III.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8601 号

## 30 年回顾与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学术报告集

---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mailto:caijing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周 丽

责任编辑 / 周 丽 赵学秀

责任校对 / 王国毅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42.5

字 数 / 804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012 - 8

定 价 / 98.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CONTENTS

|                              |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 .....  | 朱佳木 / 001        |
| 改革开放 30 年与中国美学的命运 .....      | 高建平 / 019        |
| 改革开放 30 周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回顾 ..... | 扎拉嘎 / 039        |
| 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 30 年 .....         | 陈众议 / 051        |
| 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语言学 .....         | 语言研究所专题撰写组 / 058 |
| 改革开放 30 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      | 卜宪群 / 084        |
| 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中国考古学 .....       | 王 巍 / 096        |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创新 .....        | 虞和平 / 103        |
|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                  |
| ——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 .....   | 厉 声 / 131        |
| 为新时代哲学发展努力工作                 |                  |
| ——改革开放 30 年西方哲学史研究感想 .....   | 叶秀山 / 145        |
| 价值论的兴起及其对哲学的改变 .....         | 孙伟平 / 150        |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的进展 .....       | 杨通进 / 158        |
| 30 年来中国印度吠檀多哲学的研究概况 .....    | 孙 晶 / 164        |

## 时代·传统·中国哲学

- 时代课题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30 年来的演进逻辑 ..... 张志强 / 178
- 中国基督教研究 30 年 ..... 卓新平 / 195
- 中国佛教研究 30 年 (1978 ~ 2008 年) ..... 华方田 / 229
- 伊斯兰教研究 30 年 ..... 周燮藩 / 253
- 改革开放时期的道教研究 ..... 王 卡 / 270
-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 常 欣 / 285
- 工业改革开放 30 年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 ..... 金 碚 / 298
- 农村改革 30 年的回顾与思考 ..... 张晓山 / 309
- 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建立过程与未来趋势

- 对外开放 30 年的总结与前瞻 ..... 裴长洪 / 323
- 30 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

- 历程、成就和进一步发展 ..... 李 扬 / 346
- 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 汪同三 / 367
-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

- 构建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 ..... 张车伟 / 373
- 思想解放与我国的人权法治 ..... 刘海年 / 389
- 改革开放 30 年与中国法治建设 ..... 李 林 / 409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商法律的思想发展和制度更新 ..... 孙宪忠 / 417
-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 房 宁 / 438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 ..... 王希恩 / 450
-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 王春光 / 456
- 30 年中国报业的改革和发展 ..... 唐绪军 / 477
- 中国外交的十个特色 ..... 王逸舟 / 521

|                                            |                           |
|--------------------------------------------|---------------------------|
|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               | 李向阳 / 542                 |
| 敌手、睦邻与战略协作伙伴：改革开放以来中苏中俄关系演变的<br>战略轨迹 ..... | 郑 羽 / 554                 |
| 中欧关系 30 年 .....                            | 赵俊杰 / 562                 |
| 改革开放 30 年的中非关系 .....                       | 张永蓬 / 574                 |
| 改革开放与中拉关系的新发展 .....                        | 苏振兴 / 587                 |
| 30 年美国研究 .....                             | 陶文钊 周 琪 姬 虹 王荣军 王立新 / 601 |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 .....                        | 孙 新 / 633                 |
| 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 .....                      | 程恩富 / 640                 |
|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运用、深化和<br>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     | 李崇富 / 659                 |
| 后 记 .....                                  | / 673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

朱佳木<sup>\*</sup>

## 一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特点与转折的由来

要搞清楚三中全会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首先应当搞清楚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特点。

### （一）关于两个会议的主要成果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从当时的全会公报上看，可以大体归纳为六点：一是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讨论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同意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三是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和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四是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五是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六是加强和充实党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年半时间里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进展，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从新的认识高度，将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进一步概括成八条：一是结束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之前的“左”倾错误；二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三是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

---

<sup>\*</sup> 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四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五是提出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六是着重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七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八是增选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在列举这八大成果后，《历史决议》指出：“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sup>①</sup>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年后的今天，如果要对它的成果再作进一步归纳，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二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因为，揭开改革开放序幕、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关键因素，正是这两大成果。说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主要根据也在于此。

### 1.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在 1989 年 6 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sup>②</sup> 三中全会闭幕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有六个人，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由于会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中央工作的主导权实际上已从华国锋手中转移到邓小平手中。另外，汪东兴在会议期间作了书面检查，提出辞职的请求，并在不久后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职。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又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得到会议同意。所以，邓小平所讲的三中全会建立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指也只能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对此，邓小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有更加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sup>③</sup> 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所以能够逐步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就在于有这个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提供坚强的保证。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第 82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 309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1295 页。

## 2.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对于三中全会的路线，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sup>①</sup>但无论作哪种表述，意思都差不多，都是指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后所制定并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三中全会公报上看，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在思想上，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政治上，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不放松同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斗争，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当时虽然没有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这个基本意思已经有了。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了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及时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明确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意思更加凸显出来。对于三中全会的组织路线，会后也有进一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合格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做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使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制度化。

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指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下，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要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经济制度的私有化、政治体制的西方化，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说的解放思想，绝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sup>②</sup>“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第11、236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83、193、242、275页；《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21、848页；《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第1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78~279页。

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sup>①</sup>“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sup>②</sup>“我们决定实行的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sup>③</sup>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国际一个又一个风险的挑战，之所以能够在不断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社会的总体稳定，关键就在于有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正确指引。

## （二）关于两个会议的基本特点

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取得了那么重要的成果，是否是事先就计划好的，是否有步骤地自然而然地取得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看看这两个会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不同寻常的显著特点就清楚了。

### 1. 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发出的通知和开始时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布的议题，都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但是，会议刚进入第三天，党的八大时便是中央副主席而“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中央委员会一般委员的陈云率先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现在干部、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顾虑。接着，他提出了六个影响大或涉及面广、需要由中央考虑决定的冤假错案和问题，如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的历史遗留问题，彭德怀的骨灰安放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康生的严重错误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最为敏感，也是大家最为关心但又不便于说的，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代表们纷纷表示赞成，同时加以发挥和补充。华国锋在紧接着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虽然要求会议由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转入讨论农业文件，但代表们并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而是依旧热烈讨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延伸到了关于真理标准大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9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24页。

讨论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对“两个凡是”的提法和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意见、对中央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建议等重大现实问题。

鉴于会议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会议开始不久后出访回国的邓小平，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力促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与会代表所提问题一一作了答复，宣布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予以平反，决定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部文件，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交由中央组织部审理，对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交由地方自行解决。这次会后，胡乔木在小组发言中又提出，真理标准问题已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政治问题，建议华国锋能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作一个结论，以便统一全党思想，澄清国内外各种猜测。于是，华国锋在第四次全体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的提出作了自我批评，对没有能及时解决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分歧作了解释。

会议对原有议题的突破和取得的进展，使邓小平会前准备的讲话稿也显得不再适用。会议临近结束时，他针对会议内外出现的新情况，亲自草拟了讲话提纲，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研究经济建设上的新情况，解决经济管理方法、管理制度改革上的新问题等。这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会议作出了深刻总结，为全党指明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事实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三中全会原定议题是审议通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后提交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年的计划安排，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但事实上，它除了上述内容外，主要是学习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确认中央工作会议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及增选和增补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 2. 会议持续的时间长，解决的问题数量多、分量重

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原定会期20多天。三中全会原定与中央工作会议间隔十来天，在12月10日召开，会期3天。但由于工作会议讨论十分热烈，不断有新问题提出，使会议结束时间一延再延，实际召开36天。三中全会则紧接着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2天后召开，会期也比原计划延长2天。两个会加在一起共有41天，如果把它们合起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12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算起，到11月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平反决定，共14天，为发动阶

段。其间主要讨论历史遗留问题，也涉及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

第二阶段从11月26日到12月13日的小组讨论，共18天，为深入阶段。其间主要议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情况，对中央个别领导提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的人事安排提建议。

第三阶段从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到12月15日下午工作会议结束；再从12月17日三中全会召开小组召集人会议到12月22日三中全会闭幕会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黄克诚等9人为中央委员，以及通过全会公报，共7天，是总结阶段。其间主要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酝酿增选、增补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名单，同时继续发表前两个阶段没有讲完的意见。

### 3. 会议气氛生动、活泼、热烈，真正做到了面对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议开始时，还有扣压简报的事情发生，但当代表提出意见后，情况很快变了，基本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直言不讳；简报有闻必录，印发及时。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评价中央工作会议时指出：“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sup>①</sup> 陈云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即席讲话中也说：“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种种干扰，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sup>②</sup> 他们这些话，高度概括了会议的真实情况。

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少有的。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当代史上伟大转折的直接原因。它说明，三中全会的胜利并非自然而然取得的，而是与会的大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40～141页。

<sup>②</sup> 《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231页。

多数高级干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支持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争取到的，是来之不易、弥足珍贵的。

## 二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与转折的必然性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主要不是全会公报所讲的那些内容；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成那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事先也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那样一个结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是偶然的、突发的，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呢？应当说，转折发生在1978年11月，发生在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sup>①</sup>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也是这样。如果把它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把它放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国际、党内党外、主观客观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个转折绝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或迟或早总要发生。

### （一）转折的客观条件

自从1976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里，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和一些成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严重阻碍了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步伐，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 1. 政治上

那两年揭发、批判、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也部分地得到了进行。但是，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不仅未能顺应党心民心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系统清理在党内已持续很长时间的“左”的指导思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乘胜前进，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7页。

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再拖延和阻挠恢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并且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在粉碎“四人帮”后焕发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起党内外同志的广泛不满。因此，要求尽快解决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文化大革命”及此前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评价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及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呼声，变得日益强烈。

## 2. 经济上

那两年制止了许多地区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混乱状况，使国民经济开始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但是，华国锋在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又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使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失衡，违背了人民要求尽快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犯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他虽然看到了国外技术的进步和中美、中日关系解冻后西方在对华贸易、投资方面出现的新形势，提出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举借外债，但是不考虑国内对引进技术设备的配套和消化能力，也不考虑还债的能力，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同样是“左”的急躁冒进思想支配下的表现。这一切都迫切要求经济工作中认真清理“左”的指导思想，对国民经济进行一次重大比例关系的调整。另外，在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违反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在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极大制约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致使粮食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一亿多农民有待解决温饱问题。在城市，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学毕业生实行上山下乡的政策，累积约1000多万返城的知识青年待业，再加上其他新生劳动力的出现，使国家无法单靠国有企事业单位满足就业需求；另一方面，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企不分、所有权经营权不分、统收统支的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弊端，也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到了非改变不可的程度。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呼唤对经济体制、经营方式、所有制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

## （二）转折的主观条件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下，通过部分平反冤假错案，使许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争论，通过按

劳分配问题和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及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很大宣传，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克服“两个凡是”的错误、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及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舆论氛围。这一切，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 1. 组织上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夕，陈云为呼应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意见，与王震等几位中央委员相约，在会上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他提交书面发言后，会议简报组要求“按照华主席讲话精神”删去所谓“敏感”内容，华国锋也登门做他的工作，均被他拒绝。这篇发言虽然最终未能在简报刊出，但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央内部的错误领导形成了巨大压力，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进程。四个月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撤销的一切职务。与此同时，经过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争取，一些老同志也陆续恢复了工作。所有这些，都使党中央决策层、领导层内正确与错误两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因为如此，陈云那篇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议程的发言，才可能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邓小平在会议期间的运筹帷幄、因势利导，尤其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才可能发挥出巨大作用，从而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奠定重要基础，使那次会议最终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

### 2. 思想上

邓小平自从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后，便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利用各种场合，提出并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相继提出“四人帮”清查运动要适时结束、要加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等主张。1978年夏季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要加强综合平衡，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发挥部门、地方、企业的积极性，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等一系列具有改革开放思想的观点。正因为有这个铺垫，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才会一致拥护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肯定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要求平反各种冤假错案，赞成认真解决国民经济中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意克服经济管理体制中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另外，由于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所开展的斗争，使以往中央会议简报工作那种压制民主的错误做

法越来越不得人心，难以再实行下去。这也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各组讨论情况得以迅速交流、会议获得巨大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邓小平在1980年初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曾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sup>①</sup>只要了解了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对于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就会有更加深切的理解，就会明白那次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完全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与国内外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假使那次会议未能实现这一转折，此后的会议也一定会实现。

### 三 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与转折的性质

我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是从三中全会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等意义上讲的。看不到转折的这些意义，或者对转折作超出这些意义的解释，都是不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

#### （一）转折不是党的领导工作一般意义上的转变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曾有过多次工作重点的转移、指导思想的转变、发展战略的转折。其中有的正确反映了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有的则被实践证明是脱离实际的；有的转得比较顺利，有的则因为种种原因转得不够顺利，甚至中途出现反复。就拿党的工作重心、中心、重点来说，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全国解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眼睛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sup>②</sup>。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接连进行了肃清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但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工作重心转移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7~1428页。

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虽然又接连进行了三大改造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这些运动从总体上说，也都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只是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后，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才开始动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中心更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与以往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无疑带有更根本的性质，实现的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发展战略的转折也无疑比以前深刻得多。究其原因，除了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主要在于这次转移、转变、转折，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以下两个新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 1. 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上

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中央政治局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一致拥护，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是，在对工作重点转移的解释上则是有分歧的。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中说，重点转移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并提出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实现重点转移。所谓“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解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质疑。例如，胡乔木在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发言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该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还指出，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政治脱离经济也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这篇发言被简报全文刊出后，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了更为精辟的阐述。他说政治路线的问题解决了，今后看一个部门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sup>①</sup> 三中全会公报吸收了邓小平讲话的精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50页。